

古代注释史初探（上）

汪 耀 楠

一、注释史与经学史

我国注释学的历史几乎和文籍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

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首先是儒家经典，即六经：《易》、《书》、《诗》、《春秋》、《礼》、《乐》。这是从殷至周流传下来的上古最重要的文献。古代的注释史，就是由注经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注释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经学史。

经在中国近三千年的封建社会生活中处于极为显要的地位，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由经学奠定的。刘勰曾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宗经》）又说：“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序志》）这样就使讲析注释经书词义和义理不仅为统治者所提倡，也为知识分子所追求。这是我国注释学在秦汉之际就已十分昌盛，并且一直绵延不绝，到清代达到极盛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说，我国的注释史，首先是经学的发展史。经书以外的文籍注释是在经学注释后发生的。

这个情况和西方的解释学相似。解释学是现代西方的重要学术流派，它的研究对象是“本文”，如研究《圣经》理解问题的“释义学”（exegesis），研究古典文献理解问题的“文献学”或“语文学”（philology）。解释学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已由研

究具体文献、经典的解释方法和规则问题而进入到各个领域一般性问题的理解，成为哲学的范畴，这又和我国宋代由注经而发展成的理学相似。但是不论解释对象和所属范畴如何变化，它的基础和重点是研究和分析言语意义的理解，这一层却是不会改变的。这是因为：“本文”是话语的著作，是由语言符号构成的。

“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也是理解存在的媒介。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表述的这个观点和我国注释学以语言的注释为基础又是一致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注释学史又是文献语义的研究史。

二、经籍的传授与早期的注释——注释基础的奠定

（一）经籍的传授和子夏在早期注释中所起的作用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又为《易》作《十翼》，在经籍的整理和传播史上有着不可泯灭的功绩，而他的弟子卜商（即子夏）在经籍的注释中却起到了奠基作用。

《后汉书·徐防传》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于《易》则有传（《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有《周易卜商传》二卷记载。其书不传，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之，实系伪托。）；于《诗》则有序，毛公之学，出自子夏；于《礼》则有《丧服传》；于《春秋》，则《公羊》、《谷梁》二传亦为子夏所传授。《书》的传授不详，与子夏亦似有关。《尚书大传》：“子夏读书毕，见夫子，夫子问焉，曰：‘子何为于《书》？’子夏对曰：‘《书》之论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于夫子，志之于心，弗敢忘也。’子曰：‘《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繇》可以观治，《鸿范》可以观度，《六艺》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通斯七观，书之大义举矣。’子夏既能闻孔子所授“七观”之义，则秦汉之际《尚书》的注释，极可能亦

同《诗》、《春秋》一样，与子夏有密切关系。

郑鹤声、郑鹤春著《中国文献学概要》，据梁启超说制《六经》（《六经》失《乐》，实为五经）传授师承表，反映了经籍早期的注释情况，可资参考。

（二）早期注释的特点

1. 《春秋》三传

《春秋》为经，左氏、公羊、谷梁为传，三传各不相同，都是对“本文”的诠释。《左传》之作重在史实的叙说，是记事之史；《公羊传》、《谷梁传》重在微言大义的探求，与后世的训诂义理之学大致相同，但都不具备文籍注释的典型特征。如《春秋·隐公元年》：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据此写成一篇四百四十余字的有名故事，记述了这一事件的起因及过程，《公羊》、《谷梁》却只对何以用“克”何以郑伯之弟不称弟而称名，何以要出地名“鄢”作分析：

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已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公羊传》）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谷梁传》）

《公羊》、《谷梁》与《左传》对立，《公羊》、《谷梁》在诠释上也往往严重对立。因此后世学者或宗《左传》，或宗《公羊》，或宗《谷梁》，与朝廷的旨意和今古文之争搅在一起，形成不同学派。后世学者对经籍词语的注释，史实的补充，微言大义、措辞褒贬色彩的探求，义理的分析，都可以从三传中

找到渊源。

2. 《诗》毛传

早期的注释，以《毛诗》最为完备。毛亨传《诗》，十分注重经义的揭示和词语的注释，如《邶风·静女》：

《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静，贞静也。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言志往而行正。）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既有静德，又有美色，又能遗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无大小，记以成法。）彤管有炜，说怿女美。（炜，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

自牧归荇，洵美且异。（牧，田官也。荇，茅之始生也。本之于荇，取其有始有终。）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非为荇徒说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遗我法则。）（以上正文注释。）

《静女》三章，章四句。（以上章句划分。）

毫无疑义，毛传已具备了完整的注释形态，而毛传的注释方法也是丰富多采的。唐人孔颖达撰《毛诗正义》，清人陈奂撰《诗毛氏传疏》都注意到这一层，对毛传的训诂条例作了必要的分析。

注释方法，不外乎释词义、释句义、揭示义理、概括归纳主题的方法。从所录例证中可以看出，毛传内容的完备，方法的合理与灵活，堪称古代注释的楷模。章太炎先生曾给《毛诗故训诗》以至高评价，不是没有道理的。

毛传释词，或以单字为释，或以复词为训，或作定义，或状形貌，或释句意换字以释词，或为声训以点明含义，或释所指，或释所喻，或释所寓。释句，或用翻译，或说明原委，或迳揭示言外之意，或反其意而译释。

毛传每于释词后揭示义理，而每篇诗的小序则是对本篇诗的写作动机和诗歌主题的集中概括。如“《凯风》，美孝子也”。

“《雄雉》、刺卫宣也。”“《旄丘》，责卫伯也”。所谓“美”，就是歌颂；所谓“刺”，就是讥刺，批判；所谓“责”，就是指责。

毛传对主题的揭示，对义理的分析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可贵的参考。不过牵强附会，妄说义理处极多。因此对《小序》及诗中义理分析应取分析态度。据宋以后学者考证，《小序》乃汉人注家所为，不可尽信。

《春秋》三传和《毛诗故训传》是我国早期注释的代表，反映了我国的注释学从一开始在内容的完备和方法的科学方面就达到了可观水平。

三、东汉——注释的繁荣

西汉之时，注释经书的基础已经奠定，到了东汉，由于政府提倡，注经很快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永平（公元58—75年）时，明帝亲自讲析经书，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详考五经异同，连月乃罢。

东汉以注释名家者很多，最为著名的有卫宏、牟长、李育、杜林、杜子春、郑兴、郑众、杜抚、贾逵、王逸、许慎、服虔、马融、赵岐、杨终、郑玄、荀爽、何休、张翊、卢植、高诱、应劭等二十余人，撰述极丰。东汉注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注释范围的扩大。东汉的注释仍以五经为主，后出之书也开始引起重视，成为注释对象，如《论语》、《孝经》、《孟子》、《老子》、《楚辞》、《淮南子》、《国语》、《汉

书》、《战国策》、《吕氏春秋》的注释都先后出现，注释对象已扩展至子书、史书、文集。

(二) 注释的深入。西汉时同一经书的不同注释，如《春秋公羊传》与《谷梁传》这种情况不多。西汉以前经师所重视的是师法，是传经之原。到了东汉，注家蜂起，同出一源者往往自立门户，聚徒讲学，成为一家之祖，家法代替了师法。

自刘歆以后，今古文之争激化。这种论争一方面造成学术的混乱，一方面又推动学术的深入，与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有相似之处。

今文经注重视“微言大义”，古文经注重视名物训诂，其目的都在保持经籍原貌，求得经义真谛。同一经书，不论派系如何不同，只要注释合于经文本义，就应当肯定。今文经注流传下来的不多，但从何休《公羊解诂》看，其探求“大义微言”和注释学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注释深入的最主要标志是经注之注，如《公羊解诂》。

《春秋公羊传》：“妇人谓嫁曰归。”何休解诂：“妇人生以父母为家，嫁以夫为家，故谓嫁曰归，明有二归之道。……《礼》：男之将取，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女之将嫁，三夜不熄烛，思相离也。”（《隐公二年》）

《毛诗故训传》郑玄笺也是经注之注：

《诗·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毛传：“凿墙而栖曰埘。”郑玄笺：“鸡之将栖，日则夕矣，羊牛从下牧地而来，言畜产出入尚使有期节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

经注之注，近于后世的疏，或释其未详，或补其未备，对读者都有帮助。

注释深入的另一标志是驳难的出现，论争的激化。白虎观会议今文学家李育与古文学家贾逵的对立；郑玄的《发墨守》、《箴

膏肓》、《起废疾》与何休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谷梁废疾》的对立；同属古文学家的郑玄的《驳许慎五经异义》与许慎《五经异义》的对立，都是注释学在探求经义方面升华的生动反映。

从封建时代整个注释史和经学史看，古文学虽占很大优势，但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说，今文经学的注释价值并不可低估。我们不能如汉人的古今对立，更不能如康有为全面反对古文经学。今人注释古书应实事求是，不主一家，兼采各家之长。事实上古文经学家许慎著《说文解字》、郑玄注《三礼》，并不排斥今文学家的成果。汲取其可取者，不囿于门户之见，才是正确的态度。

（三）集注的出现，这是注释学的一大进步。集众说于一书，考辨异同，断以己意，使注释与论断建立在有充分依据的基础上，以提高其可信程度，为读者提供丰富的参考材料，这个功绩是不小的。

汉人的集注已不可知其原貌，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只能在唐人颜师古《汉书注》中见到零散材料。《史记》在《汉书》之前，今所见古注唯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种。裴骃去汉未远，其书采诸家《史记》音义，并参证以经传，故名集解。在应劭以前是否有《史记集解音义》是难以定说的。《汉书集解音义》的出现，为文籍注释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类书的编纂提供了参考，其意义是深远的。

（四）集大成者的产生。汉世学术空气浓厚，经注宏富，加之西汉末刘歆以来今古文之争激化，推动了学术的深入发展，为集大成者的生产准备了条件，于是出现了遍注群经，熔古今学术于一炉，继往开来的学者马融、郑玄。马融（公元79—166年）遍注《周易》、《尚书》、《毛诗》、《三礼》、《论语》、《孝经》，使古文经学达到成熟境地，生徒常有千余人，郑玄、卢植皆出其

门。除注经外，还兼注《老子》、《淮南子》。郑玄（公元127—200年），初习今文《易》、《公羊》学，又从张恭祖、马融习古文经学。年四十聚徒讲学，弟子数千。著述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世称“郑学”。今通行本《十三经注疏》中《毛诗》、《三礼》注即为郑注。又作《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以驳何休，另注《周易》、《论语》、《尚书》，撰《六艺论》、《驳许慎五经异义》。郑玄对后世影响极大，为马融所不及。《文心雕龙·序志》篇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论，未足立家。”刘勰视马、郑的成就不可逾越，可见其地位的崇高。

此外“五经无双”的许慎作《说文解字》也是集大成的著作，不过《说文》为字书之属，虽为注经而作，与文籍注释毕竟不同。

汉世注释成绩巨大，流弊亦显著，繁琐寡要妄说经义是最大弊病。《汉书·艺文志》对“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顾实《汉志讲疏》说：“此指章句鄙儒而言也。发明章句自子夏，汉世利禄之路既开，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直与后世科举时代之八比经义相去一间耳。”

妄说经义，杂以讲灾异、讖纬的成分是极坏的学风，虽郑玄亦不可避免，所以后人有郑玄“不能推寻正经，专信纬候之书”之讥。妄说义理在《毛诗故训传》中亦时有所见。

不过从总体看，汉代注释学已臻于成熟。注释以语言文字的注释为基础，释字词已开始自觉运用形训、声训、义训的方法；注释范围已不限于经书；注释形式已出现集注；“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自许慎、马融、郑玄以后渐成良好学风，这都为后世注释学的发展树立了楷模。中国注释学的优良传统就是以汉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不过中国经学，注释学的畸形发展，对国家的发展并不有利。历代统治者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提倡读经；许多知识分子则以此作为摄取功名的阶梯，不惜老死章句，于国家的进步、发展略无裨益。

四、魏晋南北朝至隋——注释的深入和全面发展

自汉末郑玄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大成，结束了古今之争的纷乱局面，注释学一度成为郑学的一统天下。从魏至隋凡三百九十七年，注释学因王肃的崛起，形成王、郑的对立，此后又有北学南学之争。这一时期社会混乱，战争频繁，经籍注释难以形成大一统局面，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注释学的深入，使知识分子能够放眼于经学之外的广阔世界，有了更多的自我选择的机会，形成了经注之外多学科的发展。

（一）王学与郑学、南学与北学的对立

王、郑的对立与汉代今古文之争不同。王肃（公元195—256年），三国时魏著名经学家，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外祖父。学宗贾逵、马融，注《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不分古文今文，对各家之说有所综合。其书已佚，《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王肃不喜郑学，郑从古文注释者，往往以今文攻之；郑从今文者，往往以古文攻之。在语言文字训诂、名物典章制度、自然现象的认识、史实等方面与郑玄相左处很多。王肃甚至不惜伪造《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二书作反驳郑玄的依据，文德殊不可取。郑学、王学各有传人，从魏至晋两派的地位交替升降，持续了一段时间。

其后是南朝北朝学派的对立。《隋书·儒林传》说：“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毛公，《礼》同尊于郑氏。大

约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大抵北方学者宗两汉经学者多，南方学者宗魏、晋者多。

（二）援老庄入儒学，以玄理入注释

经籍注释本应以通过语言文字的训诂，求得本文的真谛为宗旨。然而自西汉始，以“六经皆我注脚”，借注释经籍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甚于形成哲学派别者，代不乏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大动荡、极混乱的时期。频繁战争和政权更迭，使文人士大夫消极厌世，斥儒道之无益于天下，寄心志于老庄之虚无。于是崇老庄，尚虚玄，清谈之风大盛，并借注释经籍，阐发他们的思想，形成玄学。

首开玄学之风的是何晏、夏侯玄、王弼。王弼（公元226—249年）三国时魏山阳（今河南焦作）人。与何晏、夏侯玄同开玄学之风。著有《周易注》、《老子注》。王弼尽弃汉《易》象数，用老庄的玄理说《易》，对当世和后氏治《易》影响很大。王弼注《易》，常据彼以解此，十分谨慎。《易·乾》：“九二。见龙在田。”王弼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文言》说：“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潜为未见，则见为出潜；潜为隐，则见为离隐，这就是“出潜离隐”的由来。唐孔颖达谓王注独冠古今，并非妄言。

王弼援老庄入儒学，以玄理入注释，每舍经而自作文，文辞华美，意味隽永，成为格言：

《易·颐》“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王弼注：“……夫安身莫若不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居养贤之世，不能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灵龟之明兆，美我朵颐而躁求。离其致养之至道，窥我宠禄而竞进，凶莫甚焉。”

皮锡瑞说：“弼注之所以可取者，在不取术数而明义理，其所以可议者，在不切人事而杂玄虚。”瑕瑜不掩，评价甚为公允。

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合流，张湛《列子注》受佛学影响就十分明显。

（三）自然科学注释的兴起

魏晋以后，注释随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范围，突破经学的藩篱，涉足到经典之外的广阔领域，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如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东晋郭璞的《山海经注》、葛洪的《本草注》，南朝齐祖冲之的《九章算术义注》，北朝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南朝梁《楚辞草木疏》，北朝北魏信都芳自注《乐书》、《器准图》等等，对我国的数学、动植物学、医药学、地理学、音乐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此外佛经的注释也十分活跃，并且形成了若干派别。

（四）注释方法和体例的创新

这一时期的注释在方法和体例上较两汉有了创新。裴松之注《三国志》，酈道元注《水经》是其代表。

裴松之（公元372—451年），奉宋文帝命注陈寿《三国志》。他搜集传记，广增异闻，博采群书一百四十余种，注文较正文多出三倍，保存了大量史料，开创了作注的新例。

酈道元（？—527年），著《水经注》四十卷，是富于文学价值的地理著作。《水经》为汉桑钦所作，文辞极简。据陈桥驿《水经注文献录》考证，酈道元征引地理和其它文献史料477种，此外还有碑铭等357种。以大量的文献资料来注释，使读者从注释中了解原作简短的文字记载所涉及的各种知识细节，这和普通的扫清语言文字障碍，揭示义理的注释有很大区别。如《水经·江水二》：“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酈注近六百字，其中“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至“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是描写三峡十分优美的散文。又如“又东过姊归县之南”，酈注据《地理志》、《春秋》、《离

骚》、《宜都记》详释姊归故实，说明得名由来，既生动，又清楚。

这一时期注释方法体例渐趋完备，义疏的盛行即是其证。

这是一种逐字、逐句、逐章讲析原作和注文的讲义体。上文所举自然科学及佛经的注释即有义疏。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礼记义疏》是其代表。这一体裁格局的完善在唐。

(待续)

《阙里颜太史真稿》不应归于经部

最近出版的《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经部四书类第三五一八种书题为《阙里颜太史真稿》一卷，清颜光猷撰，康熙刊本，一册，水明楼藏版。

颜光猷，字秩宗，号澹园，复圣颜子六十七代孙，康熙进士。著有《易经说义》二卷，《澹园文集》二卷，《水明楼诗集》六卷，《水明楼制义》二卷。据考《颜太史真稿》即为《水明楼制义》。该书共二卷二册，前册书名题签为“颜澹园藏稿”，卷首和书口均题《颜太史真稿》，在目录和卷首署“大主考、同考诸先生鉴定”。版心题“水明楼”，有吴郡（今江苏吴江县）计东写的序。选题共分上论、下论、大学、中庸、上孟、下孟六部分。后册书名页所题书名为《阙里颜太史真稿》附乡会朱卷，水明楼藏版，天头署康熙癸丑科，著者栏署主考、同考鉴定。书口题书名为《颜太史后稿》，有他的学生吴涵芬写的序言。

制义即八股文，又称时文，是科举时代应付考试的一种文体。因为题目都出自《四书五经》，所以又称为四书文。内容也紧扣《四书五经》，不许自由发挥，很束缚人的思想，因此文章空洞无物，没有多大学术价值，故历来主要目录书一般都不收。乾隆在修《四库全书》时，以为“时文为举业所习”，而“不并登文集”。在古籍分类上也找不到把时文归为经部的先例，历来经部只收儒家的经典著作及其正义、注疏、解故、传等方面的著作。该书既为应付科举考试的时文，就不该归于经部，同时，在善本书目上也没有把清代的八股文作为善本著录的。应归到集部别集类或杂著类。

• 李延祉 •